



五代时期越窑青瓷摩羯纹虎枕。

## 丝路千帆远 古物今尚传

文/见习记者 刘梦晓

海南日报记者 陈蔚林

图/海南日报记者 陈元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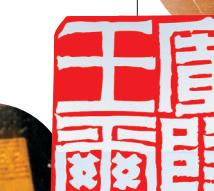
丝路千帆远，古物今尚传。12月1日上午，由海南省文体厅主办，海南省博物馆联合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六省联合承办的“丝路帆远——海上丝绸之路七省文物精品展”在海口开幕。

展览分为4个部分，依次介绍了从远古到秦汉、三国时期、两晋到隋唐五代时期、宋元时期和明清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形成、发展、繁荣的全过程。展出250件（套）珍贵文物包括瓷器、丝绸、陶器、金银器、香料、青铜器、古钱币、玻璃器、古代饰品等。其中，东汉广陵王玺金印、唐代昆仑奴女子头像铜杖首、南宋“南海一号”金腰带、清代外销瓷等堪称各参展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等等，是反映海上丝绸之路辉煌历史的重要文物。



清代青花花卉纹觚。

唐代三彩釉陶俑。



东汉广陵王玺金印。



南宋鎏金腰带。

### 艰涉鲸波 丝路初开

代表文物：汉代有段石锛、广陵王玺金印

中华民族的航海历史悠远绵长，早在新石器时代，沿海的先民们就使用简单的航海工具，以坚韧的意志和开阔的胸襟不断探索蓝色领域，开辟了最早的海上航线。

汉武帝时代，先民的足迹远至八方，在徐闻、合浦等地发舶远洋、使通互贸，也使东方大国的魅力初显于世界舞台。后至两晋隋唐的发展，再至宋元时期，海外贸易达到鼎盛，广州、泉州、明州（现浙江省宁波市）等国际性大港见证着当时帆樯鳞集的盛景。尤令人们振奋的是，明清时期，郑和七下西洋创造了帆船时代航海的世界性壮举……

这些年来，遗留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海域和国家的文化遗产不断被发掘，它们从静态文明的角度佐证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与变迁，体现了先民们战天斗浪的勇气与智慧，也预示着古老的海上丝绸之路复又焕发了新的光彩。

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令沿线国家贸易往来愈加频繁。在文物精品展中，汉代墓葬中出土的橄榄形红花玛瑙穿珠、六棱柱形水晶穿珠、玛瑙琉璃珠饰等精美的舶来品引观众驻足。

水晶剔透，玛瑙圆润，琥珀饱满，其工艺细腻柔和，历经千年时光洗炼而色不衰。章佩岚介绍，展览展出的不少舶来品源于异地，古时只有身份尊贵的人才能把玩、佩戴，或随葬入墓。这说明，海上丝绸之路开通后，沿线各国、各地区之间联系日益密切，贸易往来自然也就不仅仅停留于生活必需品的粗浅层面。

展览展出的越窑青瓷摩羯纹虎枕便可对此进行佐证——其摩羯造型起源于古代印度人对海洋大鱼的神化，一般认为是随佛教东传而进入中国。在这尊瓷枕平滑的枕

等地发现的多处人类文明遗址中都曾大量出土，在中国台湾、海南岛、菲律宾、北婆罗洲及太平洋的波利尼西亚众多岛屿，如夏威夷、马克斯等也有发现，是探讨早期人类跨越大洋进行迁移的最重要实物证据之一。

“而从春秋战国开始，海路已成为沟通我国南北及周边地区的重要通道。”章佩岚介绍，尤其是秦始皇巡游东海、汉武帝开拓南方航线等，都是中原文化中海洋概念由虚幻转为现实的重要表现。

让人们惊叹的是，当时的北路截黄海分北线与南线，北线沿袭春秋以来绕半岛航行的海路，由登州北行，经今大连、旅顺、鸭绿江口等地进入朝鲜，继而可由朝鲜半岛西岸南下，过对马海峡，抵达日本九州岛北部；南线则可由登州直接横渡抵达朝鲜半岛

存着秦代造船的遗址。该造船工厂有三座平行排列的造船台，长逾百米，这是我国目前发现年代最早、保存较好的造船遗址。充分说明在秦代时，人们就已经可以造出排水量25到30吨的大船，令人惊叹。

值得一提的是，在文物精品展中展出的“广陵王玺”金印，现已考证为东汉光武帝刘秀第九子——广陵王刘荆之物。金质的正方形印上置龟钮，阴刻篆文“广陵王玺”四字。

无巧不成书，1784年，日本福冈志贺岛发现一枚金印，上缀蛇钮而阴刻篆文“汉委奴国王”。通过反复研究与对比，两枚印章在尺寸、重量、花纹、雕工和字体上如出一辙，雕刻时间也仅相差一年左右。

史书有《后汉书·东夷列传》中就有提到：“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光武赐以印绶。”章佩岚说，这两枚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发现的印章，目前已经成为中日两国往来的最早实物证明之一。

### 丝路渐盛 货通万国

代表文物：唐代昆仑女子头像铜杖首、南宋金腰带

一路上，摩羯纹附势而刻，一虎双头工艺精细，就是工匠在受到异域文化熏陶之后的成果。

此外，同时展出的海兽葡萄镜、长沙窑瓷器、双鹦鹉纹镜等文物，也都分别融入了海兽葡萄纹、狮子造型、鹦鹉纹、椰枣纹等外来元素，颇有一番异域风情。

顺着章佩岚所指的方向，几尊铜像、陶像活灵活现地立在一旁。屈身细看，那昆仑女子头像铜杖首上，女子卷发服帖、高鼻大眼，哪里是中原女子的模样？细问才知，在唐代，所谓“昆仑奴”指的便是来自印尼、马来西亚的棕色人种。章佩岚说，正是因为当时外籍人士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成规模地到访中国，才引起了能工巧匠的注目，依照他们的容貌惟妙惟肖地打造了各种摆设和器物。

到了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发展日渐鼎盛。随着全国经济重心南移、航海技术突飞猛进，更多航线被开辟出来。大规模的国际性商贸活动，使得海外商品的数量与种类空前丰富，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化观念、宗教信仰、艺术风格逐渐交融，绵延至今。

章佩岚介绍，当时，广州、泉州、明州是著名的港口，从那里出发的福船、广船、沙船、鸟船又是适合在不同水域条件下通行的船型。为了扬帆远航，智慧的闽海人还发明了指南针、牵星术等，用以在茫茫大海上明晰方向和定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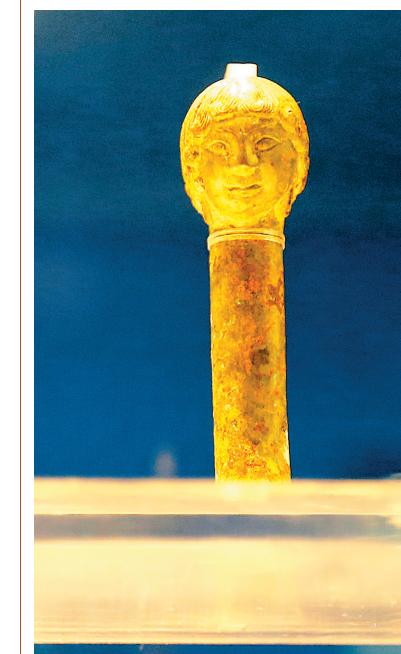
时空流转，1998年，德国打捞公司在印尼勿里洞岛海域一块黑色大礁岩附近也发现了一艘名为“黑石号”的唐代沉船。船只装载着经由东南亚运往西亚、北非的中国货物，仅瓷器就达到6.7万多件。章佩岚说，如此大规模、大批量的贸易往来，足以证明中国船只行迹之远、中国货物畅达易销，更足以证明当时中国对外开放的繁盛通融。



唐代越窑青瓷双龙罂。



五代时期孔雀兰釉陶瓶。



唐代昆仑女子头像铜杖首。



清代漆描金人物纹茶叶盒。

### 大洋通衢 丝路涅槃

代表性文物：清代广彩瓷、漆描金人物纹茶叶盒

2.7万余人组成的船队浩浩荡荡，帆樯鳞集，雄伟壮阔。细看那船阵布局，宝船、座船、马船、粮船、补给船等船相连，排布极为科学规整。

这是文物精品展中展出的，明代初期郑和七下西洋时一次船队布阵图。纵观其百年前后，无论是葡萄牙的达·伽马、意大利的哥伦布还是葡萄牙的麦哲伦，出海时使用的最大船舶吨位都还不到郑和用船的十分之一。郑和七下西洋的宏伟篇章标志着中国古代航海技术达到了一个巅峰。在这个大背景下，民间的交往和贸易同样因各类因素而阻滞，中国的麝香、丝绸、色线、樟脑、青瓷盘碗等，都是最受各国来使青睐的货品。东西方的交往和碰撞在新变局之前，激荡出前所未有的璀璨光华。

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至1841年八十余年间，清政府实行严格的对外贸易管理制度，仅保留广州“一口通商”。那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及垄断性的通商特权，促使广州成为最大的外销及舶来品集散地。

也是在那时，广州地区多种多样的工艺品制作技艺因海外需求巨大而日渐精益，融入了岭南人的巧意天工，愈发光彩夺目——广彩瓷色调鲜艳，富丽堂皇，融合中国传统绘画与西洋技法；石湾窑彩陶色彩丰富多变，塑造的人物、动物造形逼真生动；还有牙雕制品精工细作、玲珑剔透……

“哥德堡I号”是18世纪著名的瑞典商船，曾3次到访广州。章佩岚说，1745年1月11日，“哥德堡I号”从广州启程回国，船上装载着大约700吨的中国物品，包括茶叶、瓷器、丝绸和藤器。海上航行8个月后，“哥德堡I号”不幸沉没于港口之外200米处。人们从沉船上捞起了30吨茶叶、80匹丝绸和大量瓷器，在市场上拍卖后竟然足够支付“哥德堡I号”这次广州之旅的全部成本，而且还有所获利。茶叶、瓷器等都是在当时欧洲市场上炙手可热的货物。其中，又以茶叶最受欧洲人的追捧，大批量茶叶经由海上丝绸之路销往欧洲，被欧美国家誉为“饮料之王”。特别是产自武夷山等地的茶叶通过厦门、广州等地大规模出口，为当地茶农带来了极为可观的收入，白银也因此大量流入中国。

展厅里就有大量琉璃茶碗、陶茶碾、漆描金人物纹茶叶盒等文物记录了这一片叶子的杰作。

中国封建王朝逐渐跟不上工业文明发展的脚步，蒸汽机的轰鸣终于取代古老的帆影，成为以欧洲为主导的新航海时代的标志，也宣告着海上丝绸之路进入了新的时期，中国的聲音日渐微弱。但昔日辉煌不会随岁月远去。2013年9月和10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期间，分别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

人们知道——古老中国尘封多年的海洋记忆将被唤醒，满载荣光的海上丝绸之路将再谱新篇。■



清代广彩开光人物故事图大碗。